

※文哲譯粹※

朱謙之的大同思想

——關於朱謙之《大同共產主義》、《國民革命與世界大同》、《到大同的路》三著作之初步考察

竹內弘行* 著 陳瑋芬** 譯

緒 論

早年筆者由《老子校釋》¹這本書知道朱謙之(1899-1972)，不過真正深入研究，則是受託為森紀子的《轉換期中的中國儒教運動》寫書評之後的事²。

筆者曾經以「康有為大同思想的形成與其影響之研究」、「中國近現代大同思想研究」為題，得到日本文部省科研費的補助，探討康有為的大同思想在近現代思想史中所掀起的波瀾³。特別注意到孫文之積極提倡大同思想，與俄國革命後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密切相關，正在積極研究其經緯⁴。

* 竹內弘行，日本名古屋大學教授。

** 陳瑋芬，本所副研究員。

¹ 朱謙之：《老子校釋》，收入《新編諸子集成》第1輯（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4年）。

² 森紀子：《轉換期における中國儒教運動》（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5年）。本書第七章〈泰州學派の再發見——虛無主義から唯情主義へ——〉提及朱謙之在五四文化運動之後重新評價傳統文化，筆者由此對朱謙之的整體思想有進一步瞭解。筆者所作書評刊載於《東洋史研究》第64卷第4號（京都：東洋史研究會，2006年3月）。

³ 有關1880年代大同思想的探討，請參閱拙稿：〈陳虬〈治平三議〉の大同思想〉（《加地伸行博士古稀記念論集》〔東京：研文出版，2006年〕）。1890年代部分，詳見拙稿：《康有為大同思想の形成とその影響に関する研究》（2004年度科研費報告書，第1部第3章）。而關於1900年代的大同思想，手邊尚有〈晚清におけるユートピア小説として大同思想とその普及〉與〈無政府主義者の大同思想〉之兩篇文章尚未完稿。

⁴ 因大同思想的盛行，孫文也在三民主義中採用了大同思想。孫文的三民主義思想在1920年代接納了共產主義，其逝世後，由於相關解釋者的政治立場不一致，交錯發展出複雜的結果。

也因此，當筆者發現朱謙之的著作《大同共產主義》，一如書名所示繼承了孫文的大同主義時，便引發研究的興趣。朱謙之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的短短兩年間發表了《大同共產主義》、《國民革命與世界大同》與《到大同的路》三部著作，在此之後，不論是朱謙之本人、或是現代思想史，都刻意忽略了這三本著作⁵。然而本文希望探討其內容概要與意義所在。

一、朱謙之的生涯與《大同共產主義》三部著作

朱謙之生於福建省福州的醫師世家，據稱十三歲前便失去父母與胞妹，產生厭世的想法。民國初年就讀福建省立第一中學時，沈迷於《左傳》、《史記》、《通鑑》等史書的世界裏，並曾投稿《民生報》，顯露其早熟的文才。一九一七年十九歲進入北京大學法科預科，終日沈浸於書海中，因幾乎讀遍圖書館的各式藏書，翌年成果陸續顯現。他首先批判胡適等人的實用主義 (Pragmatism)，次又作〈無政府共產主義評論〉，把集產主義與布爾雪維克主義 (Bolshevism) 視為俎上肉（《現代思潮批評》）。他當時的哲學立場是徹底的無政府主義與虛無主義，可視為一種宇宙革命論⁶。

但是朱謙之在一九一九年，二十一歲時，捲入了五四運動的漩渦，七月企圖自殺，引起騷動。一九二〇年，二十二歲製作了激進傳單「中國無政府革命計劃書」而遭逮捕並入獄百餘日。一九二一年，二十三歲突然赴杭州，決定出家。如此由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的偏激舉止，如今看來就像未經世事的年輕人衝動般，也可以窺知朱謙之基本性格之一端。

⁵ 關於朱謙之的著作，筆者採用黃夏年編：《朱謙之文集》（全 10 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年）。另外亦參閱黎紅雷編：《朱謙之文集》（全 1 卷）（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 年）與黃夏年編：《朱謙之選集》（全 1 卷）（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年）。以下引文出自黃夏年所編之《朱謙之文集》，略記為《謙之文集》。而思想史意圖抹滅這些著作的相關探討，請見本文第四節。

⁶ 請參閱黃川心：〈序〉，《謙之文集》，卷 1，頁 1。以及上揭森紀子著作第 216 頁以下文章。朱謙之的自傳有《回憶》（1928）、《奮鬥廿年》（1946）、《一個哲學者的自我檢討——五十自述》（1951）以及《世界觀的轉變——七十自述》（1968，發表於 1980-1981），皆收錄在《謙之文集》第 1 卷。

朱謙之在杭州出家後，對「僧界」感到失望，又結識了郭沫若(1892-1978)與鄭振鐸(1898-1958)兩位文友，自覺「真情之流」而樹立了「唯情哲學」。此際刊行了《革命哲學》(1921)、《無元哲學》(1922)與《周易哲學》(1923)等，自一九二二年至翌年於《民鐸》上連載其〈唯情哲學〉。

上述主張，和梁漱溟所著以中國傳統儒學與佛學為基礎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1)同樣，都是五四文化運動時期批判儒教的「復古」論調之一。而朱謙之在確立自己的哲學基礎後，於翌年(1924)二十六歲時接受廈門大學聘任，卻又在一年後辭去教職，隱居杭州西湖畔，專心著述。

朱謙之在西湖畔寫作了《謙之文存》⁷與《歷史哲學》⁸二書，眾所周知那是孫文逝世(1925)，翌年國民黨北伐開啟了「國民革命」的時代⁹。

朱謙之也無法在這樣嶄新的政治性動向間保持沈默。他那激進的熱血又開始奔流，自一九二六年起的短短兩年間便陸續完成《大同共產主義》¹⁰、《國民革命與世界大同》¹¹與《到大同的路》¹²三部著作，讓國民革命的歷史意義更鮮明。

一九二七年夏，朱謙之經由梁漱溟的介紹到廣州，擔任黃埔軍校教官，該校可以說是廣東國民政府推動的國民革命本部。一九二八年完成的《到大同的路》就是以當時的教學講義為主所改寫的著作。詳細內容將於後述，這裏僅指出北伐之國民革命，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已經逐漸完成國內統一。

一九二九年三十一歲時，他舉債赴日留學（而後獲得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資助），兩年後回國。一九三一年獲聘上海暨南大學，翌年三十四歲時轉至廣東中山大學任教，長年在此講授歷史哲學與文化哲學等課程。眾所周知，革命後的一九五二年，他五十四歲時受到北京大學的邀請於該校研究東方哲學。最後因腦溢血而在

⁷ 1925年自序，1926年由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⁸ 1926年由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⁹ 有關國民革命的梗概，可參閱樞木利夫、坂野良吉：《中國國民革命——戰間期東アジアの地殼變動》（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97年）；北村稔：〈北伐開始後の第一次國共合作の實態——蔣介石と共產黨の關係を中心に——〉，收入狹間直樹編：《中國國民革命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2年）等書。

¹⁰ 1927年1月1日序，同年由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¹¹ 1927年由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¹² 1928年初完稿，同年由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文革的一九七二年四月去世¹³。

一般認為孫文逝世（1925年3月）和國民黨北伐（1926年7月1日〈北伐宣言〉），對朱謙之的著作《大同共產主義》等大同三部著作造成極大的影響，但是朱謙之卻在他的自傳《回憶》（1928）中，指出自己脫離宗教教育與國家主義的桎梏後，持續發揚自我的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想及唯情哲學，企圖撤去現在國家的界域，實現人類全體的大同世界。他說：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我在廈門大學擔任了兩種功課，一種是「中國哲學史」，一種是「中國文學史」，另外還講了一種「歷史哲學」。這些歷史的研究，大部分都已經刊布出來。最重要的，卻在這個時候，能充分給唯情哲學以歷史發達的基礎，並且宣布我治學的方法，是一種「歷史的方法」，就是「進化的方法」。……此外我還有兩次公開講演（見《謙之文存》），都是開明反對現代的學校教育，而極力尊重唯我主義的教育的。我以為現在人間教育，差不多都基礎於兩個誤謬的主義上，一宗教教育，二國家主義教育。我最恨的，是國家主義教育。以為「在這種教育之下，不但人道是沒有了，簡直連天性的愛情都沒有了！他們心目中只知有一個抽象的國家，而不知具體的實在的重要。他們心目中只看見一個占更籠統的國家，卻不知人類情感愈發達，就可撤去現在國家的界限，而實現人類全體的大同世界了」。但是我們要知道的是廈門大學的校旨，第一條就是要「採取國家主義之精神」的，廈門所有的學校，又是完全在基督教育勢力之下，那末在這樣情況之下，我怎好出來觸犯他們教育的尊嚴呢？我的歷史哲學歸結於理想的大同社會，這個社會是沒有政府、沒有法律、沒有金錢、沒有買賣、並且沒有什麼資本家，這樣自由思想的傳播，又怎能長久相容呢？¹⁴

¹³ 朱謙之於1932年轉任中山大學教職，1935年與何絳雲結婚，共同完成《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孔德的歷史哲學》、《文化哲學》等著作。1938年面臨廣州因日本侵略而失陷的衝擊，據稱因此放棄了「無政府主義」與「唯我主義」（朱謙之：《奮鬥廿年》，《謙之文集》，卷1，頁82-85）。

¹⁴ 朱謙之：《回憶》（我的講學時代），《謙之文集》，卷1，頁62-63。《謙之文存》所收〈唯我主義與教育〉，《謙之文集》，卷2，頁119。這《回憶》文中以回憶自己與一個名叫沒累（Merry，楊沒累）的女性在西湖畔相愛的生活讚歌。相關研究在森紀子前引著作中有詳細分析。

他在文中說明自己於一九二四年赴廈門大學任教一年後，便辭職隱居西湖畔的理由，該《回憶》文寫於「1927年8月20日在西湖畔」，可見出他同年秋赴廣東前，就計畫撰寫有關大同思想的書籍。如文所示，朱謙之構想的大同思想，是以一種歷史上必然可成的「大同社會」為藍圖。他認為若能令人們充分發揮其情性，那麼「就可撤去現在國家的界限，而實現人類全體的大同世界了」。這個「理想的大同社會」裏，「是沒有政府、沒有法律、沒有金錢、沒有買賣、並且沒有什麼資本家」。也就是無政府主義社會。不過朱謙之的大同三部著作所主張的，不僅止於此。其中所描繪的無政府主義大同社會是（一）孔子真正的理想、（二）確實的共產主義、（三）孫文三民主義的本質。下文將進一步分析。

二、朱謙之大同思想中的經學根據與反康有為的大同思想

朱謙之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發表的大同三部著作：《大同共產主義》、《國民革命與世界大同》與《到大同的路》，一如前文所述，可以說他的無政府主義和虛無主義思想是在一九二〇年代思想風潮之中形構而成。雖然內容主要描述無政府主義共產思想，但朱謙之認為這樣的概念是源自孔子之教。

所謂孔子之教，即是在儒教經典有根據。一般提及大同思想，會認為出自《禮記·禮運篇·大同章》，而朱謙之也把文中的「天下為公」視為中國政治最高理想與傳統精神。惟他在《大同共產主義》第一章解釋大同主義，指出這是《禮記·禮運篇》的思想，但是對「大同、小康」的區別表示懷疑，指出若非「殘缺錯亂」，就必須檢討該文的價值。

關於此，歷來有許多學者如陳澧的《禮記集說》中清楚指出「大同小康之說，非夫子之言」，吳虞的《文錄》也提到「儒家大同之義本於老子說」，認為它不是孔子之說，而是老子思想的混入¹⁵。

相對於此，朱謙之認為老子思想混入說未免武斷，堅決主張它是孔子之作。因為類似的文字也出現在《孔子家語·禮運篇》，將之與現行《禮記·禮運篇》相互

¹⁵ 陳澧：〈元至治二年序〉，《禮記集說》，欽定《四庫全書薈要》第57卷所收影印本，頁125。關於大同思想的由來，有孔子本意說、老子思想混入說、墨子思想混入說以及錯簡說。相關議題的整理，請見拙稿《康有為大同思想の成立とその影響に関する研究》第1部第1章。

比較，可以發現那包含「小康」的文句，「分明是後人添進來的」。他說：

現在我就把「大同」一節，用校勘的方法，把它和《孔子家語·禮運》第三十二（七卷）作一個對照表，看那些是〈禮運〉的本文？那些是錯簡？那些是後來人加增上去的？……就知道《家語》無「小康」兩個字，那麼大同小康的分別，卻從何來？……這分明是後人添進來的！¹⁶

朱謙之列舉清代的《日講禮記解義》、《禮記義疏》，以及姜兆錫的《禮記章句》、任啟運《禮記章句》、杭世駿《續禮記集說》等書，指出「他們都主張把《家語》拿來參定原文，根本取消小康的說法」，斷言「辨此一節之謬，則通篇釋然無疵」¹⁷。

然而朱謙之認為大同之說雖然是孔子真傳，「小康」一句卻是高唱老莊思想的漢人所附會。不僅如此，他還批評康有為作《大同書》提倡「小康之世」、「大同

¹⁶ 朱謙之：《大同共產主義》，《謙之文集》，卷1，頁515-516。引文中略文部分為《孔子家語·禮運篇》與《禮記·禮運篇》的比較表格。他把它認為是《孔子家語》中與原本文字不同、或被省略的部分，以粗體或括號標示。而畫線的部分，則是「後人添進來的」，21個斜體字則「這分明是脫出去的」。「孔子曰，昔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吾（丘）未之逮也，而有記（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人（己），是以（故）姦謀閉而不（弗）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則為己，力則為人，大人世及以為常（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形仁講讓，示民有常），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此者），而在位（勢）者，則（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¹⁷ 清聖祖皇帝御定《日講禮記解義》乾隆十二年復命纂輯，欽定《四庫全書薈要》第57卷所收影印本，頁645。清高宗欽定《禮記義疏》乾隆十三年，欽定《四庫全書薈要》第62卷所收影印本，頁97。姜兆錫：《禮記章句》（未確認，或為《孔子家語正義》之誤植？）任啟運：《禮記章句》乾隆刻本，《續修四庫全書》所收影印本，頁342。杭世駿：《續禮記集說》，光緒三十年浙江書局刊，《續修四庫全書》所收影印本，頁614。上述書籍皆僅收錄諸說，指摘錯簡，並未特別主張王肅《孔子家語》真經說。《孔子家語》後序中所收孔安國的序文，提到《孔子家語》是集合了未收錄在《論語》中的文章並加以編纂而成，有可能是以前漢戴聖編纂的《禮記》為基礎，清代以來《孔子家語》為王肅偽托自撰的觀點通行，若要否定此說，在證據尚不足的情況下，是無法斷言《孔子家語·禮運篇》是最初始、最正確的吧！

之世」，是再膚淺不過的舉動：

乃近人康長素全不問〈禮運〉原文是否可靠，還要分別什麼「大同」、「小康」，一面把「大同」一段認為孔子理想的社會制度，一面又甘心受古代作偽之人的欺騙，拿「小康」一段，以完成他極右的復辟派的論潮。他知道中國二千年來，凡漢、唐、宋、明總總都是小康之世，卻不知道二千年來腐儒所根據的「小康」之道，根本就是作偽欺人，就是假冒孔子名義杜撰出來的！他既不能看破「小康」的偽，也自不能認識「大同」的真，試看他《大同書》甲乙部夾七夾八說什麼「入世界觀眾苦」，便知道他的淺薄無聊，那裏算得聖人之道？¹⁸

朱謙之此類關於〈禮運〉大同說的觀點，後來也出現在革命後一九六二年所發表的論文〈關於孔子的大同思想〉中。他這麼說：

現在研究孔子，首先必須剔除其封建制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孔子思想的民主性精華，表現於〈禮運·大同章〉，這一段字數不多，卻描繪出一個民族快樂的烏托邦，儘管只是一種空想，卻給人類進步遠景提供了材料。因此，太平天國旨准頒行的《太平詔書》中引用它，孫中山在講革命的三民主義時提倡它，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也談「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問題，而指出於「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究竟大同思想的精華是些什麼？¹⁹

朱謙之在上文之後，幾乎完全引用清代對上述的錯簡說的考證，文末則指出只有在毛澤東的引領下，才能確實地「使人類進到大同境域」。眾所皆知，在毛澤東的引導下，為了實現大同思想卻演變為人民公社與文化大革命，都是朱謙之當年始料未

¹⁸ 同前註，頁 517。朱謙之對康有為的批評，亦見於《到大同的路》（頁 606、624、625）。他特別比較了與孫文大同主義之間的差異：第一、他們是以《公羊春秋》三世之義來比附大同的，說什麼昇平世為小康、太平世為大同，那末據亂世在〈禮運〉裏便沒有根據了。反之，孫先生的大同主義是完全應用《大學》裏所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系統……。第二、他們依據《孔本·禮運篇》，要分別大同小康，說什麼「今方為據亂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則陷天下於洪水猛獸」（《清代學術概論》），是胡說！所謂大同，便是孫先生所謂王道，所謂小康，便是孫先生所謂霸道，那末提倡霸道，豈不是更陷天下於洪水猛獸的嗎？（頁 625）

¹⁹ 朱謙之：〈關於孔子的大同思想〉，《謙之文集》，卷 1，頁 281-282。

及的²⁰。

三、朱謙之的大同思想與三民主義、共產主義

朱謙之認為傳統思想中，大同思想是（一）孔子思想的真傳，同時也是（二）真共產主義思想，以及（三）孫文三民主義思想的本質。他所謂的「真共產主義」是為了批判「假共產主義」所延伸的概念。所謂的「假共產主義」意指一九二四年以來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共產思想，即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所依據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等，朱謙之斷言這些是「集產主義」。雖然這個概念本身已經在五四運動中標榜虛無哲學時探討過了，但他以「大同思想」作結，仍給人相當的新鮮感²¹。

而朱謙之對共產主義的批評是依據美國學者威廉 (Maurice William) 的《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史觀》，他提到歷史的根源是心理優於物質（頁 629）、歷史進化是生存條件優於物質條件（頁 633）的觀念、否定了共產主義唯物論。中共政權成立後，他說明自己的言論是受到當時與共產主義相關的理論不足所限制。

其次將討論朱謙之認為自己的無政府、大同共產主義思想才真正是（三）孫文三民主義思想的本質這一點。孫文的確曾宣示自己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就是實現「大同之治」的成果：

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

²⁰ 大同思想說是清末今文學派所提出，但朱謙之認為清末的今文學者和古文學之間並無嚴密的區別。他列舉了莊存與《周官記》與《周官說》，莊綬甲的《周官禮鄭氏注箋》，廖平的《周禮新義凡例》與《周禮訂本略注》等，指出公羊學者是研究古文經書《周禮》並採用當時的社會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朱謙之本身的經學觀也是如此。

²¹ 虛無的無政府主義與大同思想結合，最初是在清末的「無政府主義」言論中。如真民（李石曾）的《革命》裏提到「為了自由、平等、博愛、大同可捨棄國境云云」（《新世紀叢書》第 1 集，1907 年），在巴黎發行《新世紀》的吳稚暉 (1865-1953) 於 1903 年留學英國後「奠定了一生以大同主義為終極的理想」（呂芳上：《吳敬恆》，《中國歷代思想家》第 1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 年〕，頁 320）。相反地，孫文等人的《民報》的立場，一如鐵錚（雷照性）的「政府說」一般，是主張有政府說，認為大同主義無政府說只會強化滿洲政府（《民報》第 17 冊）。不過兩派在辛亥革命後逐漸調和，雖然以無政府大同社會為理想，現實中卻為實現（民主）政府而努力。直到北伐國民革命時才又產生的新的分化。

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²²

朱謙之把孫文這三民主義的內容，學術性地按照歷史的發展區分為：1. 胚胎期(1885-)、2. 形成期(1905-)、3. 發展期(1919-)、以及 4. 完成期(1924-)。指出上述尋求「大同之治」的說法，是孫文在完成期的定論，並比較孫文和馬克思的學說道：

我從前說過，馬克思只看出社會發展，必然要達到無產階級專政，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則看到人類發展必然要達到世界大同，即孔子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他晚年留遺的東西，寫得最多的筆墨，就是「天下為公」四個大字。這就可見，「天下為公」就是孫先生的晚年定論。還有〈北上宣言〉主張「以全力保障人民之自由，輔助農工實業團體之發展」，在神戶高等女學校的講演主張以王道為基礎，聯成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大同團結，在遺囑上主張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臨到一息奄奄的時候，反來復去的只念著「和平」，這不是已經明白大同主義就是三民主義的終結目的嗎？²³

朱謙之舉孫文的〈北上宣言〉、神戶高等女學校的演講、以及逝世時的遺囑，證明其定論三民主義就是大同主義。然而關於孫文思想的解釋，還存在一個問題。

朱謙之對三民主義的解釋，並非馬克思所預言的、在俄國革命中實現的「無產階級的獨裁」，亦非當時的第三國際向中國共產黨所指示的「資產階級國民革命的實現」，當時的世界局勢，是各個被帝國主義諸國殖民或半殖民化的未開發國家底下，遭受壓迫的民族或少數民族與人民為尋求自治獨立，而使得「反共」與「反帝」兩面並存，也是國民革命實踐者所欲「北伐」的意義與目標。換言之，是一種寄託於政治判斷的解釋。

雖然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完成北伐（國內統一），完成孫文的遺願，但是在孫文逝世後，黨內便引發是不是還應該將這個由第三國際指揮的中國共產黨視為孫文同夥的疑惑，最後決定純粹的孫文思想才能確保中國的獨立，於是引發「清黨」運

²² 孫文：《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收入《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9，頁253。湯志鈞：〈《大同書》導讀〉，《大同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蓬萊閣叢書版），頁3。

²³ 朱謙之：《到大同的路》，《謙之文集》，卷1，頁647。

動。這樣的想法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北伐前，同年蔣介石在廣東發起的「中山艦事件」裏，迅速白熱化，並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上海政變中，共產黨員與其同盟者的肅清事件達到顛峰，同年七月十五日國民黨決定「分共決議」，第一次國共合作宣告破局。筆者認為，朱謙之對上述三民主義的解釋，正為這次反共清黨派的活動提供了一套有力的理論根據。

附帶一提，關於這一點，也可以從他的行動中窺見端倪。

朱謙之在一九六八年所著之《世界觀的轉變——七十自述》中描寫他雖然在一九二五年五月時隱居西湖，事實上並非遺忘政治。同居中的沒累持續撰寫〈婦女革命宣言〉，朱謙之寫作了《大同共產主義》之「烏托邦的政治著作」來「宣傳中國政治之傳統精神」，指出「大同共產是民族快樂的烏托邦」²⁴。而他在一九二六年完成《大同共產主義》後，便聽了梁漱溟的建議，於翌年一九二七年夏至秋，前往廣東。這段時期發生了蔣介石的四一二政變與七一五「分共決議」。而根據朱謙之在《世界觀的轉變——七十自述》中自稱當時前往廣東是為了「謀生」，事實上也與「後方總司令」李濟琛會面，並接受黃埔軍官學校的教職聘請。當時北伐戰爭持續進行，正處於北伐國共（「寧漢」）分裂的微妙時期，但是廣東仍舊「舉棋未定」，他回憶道：

我的《大同共產主義》剛出版，李濟琛看了我一些舊作便約我暫時留在黃埔軍校。……我在黃埔軍校不過一個月，因革命的三民主義立場，自然而然地表同情於工農群眾，而且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參加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這時只知為革命盡忠。革命以外更有何事，什麼「吟風弄月」早已置之腦後了。……²⁵

李濟琛是廣西人，篤信三民主義，當時隸屬反共派，蔣介石的左右手。相當贊同朱

²⁴ 陳來主編：《朱謙之選集》，頁 429-430。

²⁵ 同前註，頁 431-432。在此回憶中提及與李濟琛(1885-1959)接觸一事，關於當時的李濟琛支持蔣介石，逮捕殺害共產黨人，由周興探之下引文可知：「在北伐勝利的高潮中，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右派勢力加緊進行分裂國共合作的陰謀活動。李當時被蔣利用而成為逐流者之一，支持蔣發動上海『四一二』政變，之後又追隨蔣在廣州發動『四一五』清黨，捕殺了不少共產黨人，並支持蔣在南京別立國民政府，反對武漢國民政府，進行分裂活動。後來李對自己參與清黨反共的這段歷史一直深感愧疚。」（孫思白主編：《民國人物傳》〔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卷 11，頁 4）此事件背景中，介紹朱謙之到廣州的梁漱溟與李濟琛交情深厚，而與戴季陶(1891-1949)是當時廣東（中山）大學的負責人一事，應也有關係。

謙之的論調與立場。卻在不到一個月的十一月十七日（舊曆十月二十四日），便參與由共產黨員組成的「廣州公社」發動的廣州起義，朱謙之隨即經香港轉上海返回杭州。

此際，朱謙之遭遇長年因病療養的愛侶沒累逝世之痛，這是一九二八年四月的事了。結束喪葬事宜並整理遺著後，他再度前往廣州，隨後又因友人徐名鴻因思想問題遭到逮捕，心生激憤而回到上海。

接著他重新與丁玲、沈從文等文學家交往，並投身新國際性文學運動（對抗寫實派的未來派及表現派）。此後他的興趣便與三民主義大同思想漸行漸遠。國民革命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已大致完竟，統一後的國民政府對孫文主義施予新解，朱謙之的大同三部作便無人回顧。朱謙之自己在上述的《世界觀的轉變——七十自述》中指出，當時潮流皆寄託於國民革命派，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有所誤解²⁶。

四、朱謙之大同思想的本質與其在思想史中的地位

朱謙之的大同思想標榜無政府共產主義，如前文所示，其擁有相當時事性、爭議性的一面，本節試圖由學術史的角度觀之。

關於朱謙之本人的言論，在他的自傳《世界觀的轉變——七十自述》中，他由「烏托邦的政治著作」出發，撰寫《大同共產主義》，書中說明：「以人性為基礎，以大同為門戶，以美的社會組織為框廓，以禮樂為妙用，以游藝為依歸，意在撥亂反正，以躋斯世於永遠太平而止。」²⁷

簡言之，就是藉由下述五項概念「撥亂反正」，實現太平大同社會。

²⁶ 有關三民主義的再解釋，以中國共產黨的「新三民主義」最著名，雖然該文是為政權的正當性佐證，但國民黨也由戴季陶的《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等加以反駁。朱謙之對戴季陶擁有反論與同調（頁 653-654）兩種立場。如對戴季陶的尊重傳統思想帶有反對立場、對戴的主張可中止國內階級鬥爭並推動反帝民族鬥爭，在立場上是贊同的（朱謙之：《國民革命與世界大同》〔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599-600）。另外有關共產黨的國民革命論，可參閱瞿秋白的《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中山主義講演集》第 1 集〔上海：中山主義研究會，1926 年〕），朱謙之對於這文中描述的「階級鬥爭不但不破壞國民革命，而且使國民革命發展」的觀點提出反對意見（朱謙之：《到大同的路》〔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651）。

²⁷ 朱謙之：《世界觀的轉變——七十自述》，頁 429-430。

- (一) 以人性為基礎
- (二) 以大同為門戶
- (三) 以美的社會組織為框架
- (四) 以禮樂為妙用
- (五) 以游藝為依歸

而具體地說，所謂的（一）以人性為基礎，指從朱謙之的「唯情哲學」、「真情之流」可知人性本善，而這個善不只表現在「性」，「情」方面亦然。眾所皆知朱子學主張性善說、以為人之氣質（情）卻傾惡，但是朱謙之的哲學則認為人全盤皆善。他曾經在〈人性問題研究——性善說之歷史的根據〉一文中，詳細說明人的善性²⁸。

根據所言，大同社會因為完全發揮人類的善性，因此是以「自由與自治」為基礎，用 Free Agreement（自由契約）取代法律，用 Free Co-operation（自由合作）代替權力，並用「愛」勸告罪犯。一如朱謙之自己的描述，這裏所舉的概念和克魯泡特金 (Pyotr Alekseevich Kropotkin) 與「工團主義」(syndicalism) 及基爾特社會主義 (Guild Socialism) 的主張，基本原則是一樣的²⁹。雖然從客觀角度來說，這已超出傳統儒教思想的範圍，但觀察朱謙之的大同思想的本質，卻是相當值得留意的重點。

其次（二）以大同為門戶方面，在內容上包含了上述三民主義、大同共產主義思想，也就是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本質，而以「大同」為標誌。

而（三）以美的社會組織為框架的意義，在〈大同主義的政治組織〉中有詳細解說。最後（四）以禮樂為妙用以及（五）以游藝為依歸兩項並觀，可知朱謙之相信藉由禮樂陶冶人類純真的性情，能夠建立起理性知識的無政府社會。特別的是，陶冶的方法在於「音樂」，孔子重「（禮）樂」的理由在於此。而君子們藉由這樣陶冶組織的大同社會（當然，這邊指的不是國家），在負責扶助與教育的基礎下，

²⁸ 朱謙之：《謙之文存》，《謙之文集》，卷 2，頁 24-41。該文羅列中國歷代與性善相關的資料，最後以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引文「人在直覺上都自然會搜到對上去，所以知識上、人格上的錯處壞處，都是一時的，結果終究要對的。我信人都是好的，沒有壞的……人都是要求善、求真的，並且他都有求得到善和真的可能」。以及他自己的結論「這個『人們都是好的』觀念，實在就是中國人生哲學的根本精神了！」告終。可知他主張完全的善性論。

²⁹ 朱謙之：《到大同的路》，《謙之文集》，卷 1，頁 664。此處以「克魯泡特金的原理、也是我們大同社會的原理」簡單作結。

設置了下述的六院制³⁰：

1. 事務局：主掌萬事。
2. 教育院：教育機關。
3. 音樂院：用音樂感化全民。
4. 平和院：組織可維持和平的最低軍備。
5. 禮制院：德治主義。原則為「不做工，不配吃飯」。
6. 工藝院：藝能集團共產主義。

朱謙之大同思想著重性善說的教育，實質就是藝術＝勞動。這樣的觀念結合上述的教育院、音樂院與禮制院。他也就大同思想提出以下三大原則³¹：

- 第一原理：勞動藝術。
- 第二原理：藝能組織。
- 第三原理：自由自治。

關於「第三原理：自由自治」，可知所指僅限性善之人。問題在於「第一原理：勞動藝術」與「第二原理：藝能組織」是可以用音樂等藝術來陶冶的，能夠自由自治的人性，因此社會便成為以人人是音樂家等藝能團體為中心的組織。

大同的社會裏勞動就是藝術，就是自我的表現。關於這點，最能和大同原理相契合的，莫過於穆列斯 (William Morris) ……。他以身作則，大聲疾呼世界應速恢復所失敗的人性，重登那至高生活的勞動，因此極力主張藝術和勞動相結合，他所著的《理想鄉的消息》(*News from Nowhere*) 一書，就是他的有力的大同主義之快樂的烏托邦。³²

此處所提到的穆列斯 (William Morris, 1834-1896) 是英國的詩人工藝家，也是社會主義者。他的小說 *News from Nowhere* 1890，日文版為《ユートピア便り》（《來自烏托邦的消息》），主要描寫藉由再三的流血暴動後所實現烏托邦社會主義國，以及否定機械工業社會的勞動後，返回由詩人或工藝家建造中世公會的自由社會，以之為理想³³。

³⁰ 朱謙之：〈大同主義的社會組織〉，《大同共產主義》第3章，《謙之文集》，卷1，頁522-531。以及第4章〈大同主義的政治組織〉，《謙之文集》，卷1，頁532-557。

³¹ 朱謙之：《到大同的路》，《謙之文集》，卷1，頁659-661。

³² 同前註，頁659。

³³ William Morris 著，松村達雄譯：《ユートピア便り》（東京：岩波書店，1999年），頁232。

朱謙之的大同思想受到穆列斯等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影響，這個以中國傳統儒教的禮樂思想為本源所構思的理想社會，是由音樂陶鑄性情，由音樂家等藝能團體主導的社會組織，以「工團主義」來命名、以「藝團主義」來命名。如此一來，「調和的勞動 (Harmonized Labor)」成為可能，而也因此可以構成由藝術技能的差異來分辨人類能力的合理社會。這正是「天下為公」之大同思想中，「選賢與能」的原意。朱謙之如是說：

〈禮運〉開頭便說「選賢與能」，能就是「多才藝者」，換句話說，就是藝團中的最有藝術本領的人們。我們知道大同社會是包羅所有的「藝團」做組織的基礎的，所以由「藝團」選舉出來的「聯藝代表會」，實際就是我們大同社會的鎖鑰石，是藝人意思的最高表示，這一點竟可以說大同主義社會就是以藝能團體的聯合統治為理想的組織。³⁴

他認為大同思想在傳統思想中，最得孔子思想的真傳。其實如同上面所說，是以透過經書解釋，來闡揚同業公會式的社會主義。所謂的實現世界和平，在任何時代都可以見到烏托邦式的論調，此處以孔子思想為理論基礎，構造出可以和傳統儒學相連的系譜，其內容則以「工（藝）團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為本質，屬於空想社會主義，就國民黨的統一政權或共產黨的勞農政權而言，皆不可用而受到孤立，其懸隔可以想見。

結 語

朱謙之的大同思想由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八年的大約三年間所撰成的《大同共產主義》、《國民革命與世界大同》、《到大同的路》三著作所構成，是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想。然而他自己卻認為這樣的社會是（一）孔子真正的理想、（二）確實的共產主義、（三）孫文三民主義的本質。其實際內容不外乎「工團主義」、「基

³⁴ 朱謙之：《到大同的路》，《謙之文集》，卷1，頁662-663。關於朱謙之的音樂思想，本書沒有深入涉及，不過在其《音樂的文學小史》及增補的〈再論中國文學與音樂之關係〉（《謙之文存》，1925年）、〈音樂文學運動〉（《謙之文存》第2集，1949年），大著《中國音樂文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已可見明確輪廓。他認定儒學之本在於樂，並致力說明此歷史。

爾特社會主義」之空想。它雖然在國民革命中，為「國民黨革命派」與共產黨決裂提供理論根據，卻在後來被眾人捨卻遺忘。

然而朱謙之終其一生都堅持他的大同思想是孔子的理想。不過由他所參照的《孔子家語》係魏朝王肅之偽托自作而言，他不願意相信推測在前漢纂成的《禮記·禮運·大同章》，是沒有道理的。關於這一點，由於考證不足，姑且不論。

朱謙之所依據的另一個思想是孫文的三民主義，一九二〇年代俄國大革命時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在政治上推動第一次國共合作(1924)，一九二五年孫文卻突然死亡。與此同時，關於三民主義，也出現各種不同的解釋，呈現複雜的思想樣貌。朱謙之的大同思想，可謂孫文死後對三民主義的解釋之一。而他之所以特別強調無政府主義思想中的「工團主義」和「基爾特社會主義」，應該是呼應時勢所致。

此外，朱謙之提倡大同主義的同時，反對康有為《大同書》的大同思想，康的立場近乎畢拉忒的小說《回頭看紀略》（日譯本為《顧みれば》）裏描述的否定階級鬥爭後，向統一政府下的社會主義和平轉移。也因此批判暴力的「均貧富黨」（共產主義）³⁵。

最後以康有為之大同思想與朱謙之之大同思想的比較簡表，為本文作結。

康有為	朱謙之
《禮記·禮運篇·大同小康章》	《孔子家語·禮運篇·大同章》
孔子「春秋公羊學說」	孔子+孫文「三民主義」
進化論（據亂、昇平、太平）	進化論（革命鬥爭）
民主（共產）主義+相互扶助論	無政府共產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
世界統一政府	藝能式的小分化社會
畢拉忒《回頭看紀略》	穆列斯《來自烏托邦的消息》

³⁵ 畢拉忒的小說《回頭看紀略》（之後改稱《百年一覺》）出版單行本。日譯本《顧みれば》是根據美國人 Edward Bellamy（柏辣彌或稱愛德華·貝拉米，1850-1898）於 1888 年發表的未來小說（原名 *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所翻譯，該文自 1891 年起至翌年在《萬國公報》上譯載，譯者不明。給予康有為等變法派知識分子莫大影響。其內容是反對勞動運動與共產主義，主張和平地向自由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轉型。詳細內容請參考拙著《康有為大同思想的形成とその影響に関する研究》第 3 章。